**西藏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执行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共）的领导地位，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将对宗教活动的保护仅限于“正常宗教活动”，同时没有定义什么是“正常”。中共的法规仅允许中国公民参加官方批准的宗教活动，并规定宗教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安全”。中共的法规控制着藏传佛教的所有方面，包括宗教场所、团体、人员和学校，并禁止“受外国势力支配”，对此，当局说这包括流亡藏人，特别是达赖喇嘛。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局）发布了《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新法规，要求自5月1日起，所有宗教教职人员宣誓忠于中共和社会主义。该机构并建立了一个“宗教人士”数据库以跟踪他们的表现。国家宗教局在9月1日还发布了新法规，要求所有宗教学校教授习近平思想并坚持宗教的“中国化”。在西藏自治区（西藏）和其他藏区，有报告说存在由于开展宗教活动而导致的强迫失踪、逮捕、酷刑、身体虐待和未经审判而长期拘押僧人、尼姑及其他人的事件。还有媒体报道监狱当局经常性对尼姑进行性虐待。有报告称有人在拘押期间被殴打致死。有报告称，由于在关押期间长期生病和受到殴打和虐待后受伤，一些人被释放以后就死去。当局逮捕了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他们促进藏族语言和文化。继续有人因拥有达赖喇嘛的照片或所写文字而遭到当局拘捕。政府继续限制佛教寺院和其他机构的规模，并实施自2016年开始的将僧侣和尼姑从寺院中驱逐的运动，并且禁止他们在其他地方修行。中共继续推行“中国化”政策，旨在按照中共意识形态解释宗教思想并强调对中共和国家的忠诚。中共继续执行在2020年颁布的《宗教组织管理办法》的法规。该办法使所有宗教“中国化”的管理程序更为规范化。媒体报道当局采取措施要求佛教寺院将经文由藏语翻译为汉语。观察人士称此做法是当局一直企图消除藏人语言的行动。5月21日，政府颁布了一份白皮书，宣称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中国会负责挑选西藏的佛教领袖，包括达赖喇嘛。中国当局继续限制僧侣、尼姑和普通信众的宗教活动。旅行和其他限令妨碍了僧侣和普通信众从事传统宗教活动和朝觐。在政治敏感事件、宗教周年纪念日和达赖喇嘛生日前后，包括任意监控在内的压制活动有所增加。政府以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措施为由再次取消了一些宗教节日仪式并限制藏人进入宗教场所，但同时允许中国游客更容易地进入这些同样的场所。当局加强了对僧侣和尼姑的公开监控，并强迫前政治犯使用和穿戴带有记录和GPS跟踪设备的政府发的手机和脚环。非政府组织（NGO）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把在寺院和尼姑庵的监控方法描述为“达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包括无处不在的闭路摄像头、在设施附近或设施内的派出所、监视僧侣和尼姑上网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寺庙上班的数以千计的政府雇员。政府鼓励各个家庭告密邻居，并企图控制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继续迫使寺院展示中共领导人的画像和国旗，并要求藏人在家里用包括毛泽东主席、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共知名领导人的画像代替达赖喇嘛和其他喇嘛的画像。中国当局继续限制少年儿童参加许多传统的宗教节日、在学校假期期间参加朝圣或接受宗教教育。作为将人口中国化的努力之一，当局强势推行仅使用汉语进行教学。据非政府组织西藏行动研究所（TAI）报告，政府要求近80%西藏少年儿童在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入学。在那里，他们与家人分开，遭受情绪和心理伤害，并存在与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失去联系的风险。当局继续对寺院的活动进行广泛干预，包括任命政府和中共人员以及经政府批准的僧侣来管理宗教机构。政府继续控制藏传佛教喇嘛的挑选，并监督他们的宗教和政治教育。政府继续强迫僧侣和尼姑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培训。宗教领袖和政府雇员经常被要求谴责达赖喇嘛，并对政府认可的班禅喇嘛--坚赞诺布表达忠诚。官员们经常公开发表言论，诋毁达赖喇嘛并促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习近平主席在7月21日至22日到访西藏。在那里，他敦促藏人“跟党走”。当局继续在官媒上以藏传佛教寺院与“分裂主义”和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有关为由为干预其活动辩解。

根据多方消息来源，一些藏人在求职、经商和朝圣旅行时仍然受到社会歧视。

中国继续严格限制外交官进入西藏，并拒绝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提出的访问西藏的请求。在这一年中，没有允许美国外交官访问西藏自治区。美国官员不断向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表达对西藏宗教自由的关注。美国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在12月被任命的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以及其他美国大使馆官员继续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支持藏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维护其保留、信奉、教授以及发展他们的宗教传统和语言的权利。美国官员强调，达赖喇嘛继任的决定应该完全由西藏人民做出，不受任何干预，并对自1995年以来一直失踪的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的情况表示关切。本年度中，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外交手段推动西藏的宗教自由和问责，包括根据2018年的《西藏旅行对等法》继续对美国政府已经确认“大量参与制定或执行与外国人进入西藏地区有关政策”的中国政府和中共官员施加签证限制。7月，美国国务卿在新德里与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忠群欧珠会晤。4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尊重藏人根据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受政府干预地选择、教育和敬仰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权利，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利用社交媒体向成百上千万中国公民直接传递有关西藏宗教自由的信息。

**第一节 宗教人口统计**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估计的官方数据，西藏自治区共有约364.8万人，其中藏人占大约90%。汉族人约占8%。其余是其他民族。不过一些专家认为，汉族人和在那里生活的其它非藏人数字被大大地少报了。在中国的大多数藏族人居住在西藏以及青海、四川、甘肃及云南省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州）和县里。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藏人占青海省总人口的24.4%、四川省的2.1%、甘肃省的1.8%、云南省的0.3%。不过，在这些省内被指定为藏族自治地区的州县内，藏人的比例要高得多。

大多数藏人信奉藏传佛教，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少数藏人信奉苯教——这是一种在佛教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本土宗教。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一些学者估计，在青藏高原各地有多达40万苯教信徒，他们大部分也追随达赖喇嘛并且认为自己也是藏传佛教徒。学者们还估计，在西藏有多达5000名藏人穆斯林和700名藏人天主教徒。传统藏区的其它居民包括汉族人，其中很多信奉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儒教或者传统的民间宗教，或自称是无神论者；还有回族穆斯林，以及非藏人天主教徒或者基督教徒。

**第二节 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法律框架**

中国宪法规定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思想为指导思想，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把对宗教活动的保护限定在“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内，但没有定义什么是“正常”。宪法禁止国家、公众团体和个人强迫公民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宪法规定不得利用宗教扰乱公共秩序、伤害公民的健康或者干预教育体系。宪法规定宗教团体和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政府承认五个官方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只有隶属于国家批准的代表这些宗教的五个“爱国教会”之一的宗教组织才能获准在政府登记，并可合法举行礼拜活动或者其它宗教仪式和活动。

中共关于宗教的规定是由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颁布的。统战部的民族和宗教事务局通过国家宗教事务局来管理宗教事务。

统战部控制着包括喇嘛在内的西藏宗教领袖的挑选。法规规定，根据被认可的喇嘛的影响地域，相关行政部门可以拒绝允许某位喇嘛被承认为转世（一个藏传佛教的信条），而且转世必须经过这些行政部门批准。统战部宣称有权拒绝承认“格外有影响力”的高层喇嘛的转世。这些法规还规定，任何外国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预转世喇嘛人选，所有转世喇嘛必须在中国境内转世。中共有一份官方认可的转世喇嘛登记名单。

统战部发布的法规仅允许中国公民参加官方批准的宗教活动；这些法规使中共控制宗教的各个方面，包括宗教场所、团体、人员和学校。根据国家级《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框架下制定的地方法规，西藏自治区和其它自治藏区的政府控制寺院、庵堂和其它藏传佛教宗教中心的登记。管理办法还正式授权中共控制宗教建筑的建设和管理，并规定寺院举办大型宗教活动或者集会需要获得官方批准。

中央政府的《宗教事务条例》要求宗教团体必须在政府登记注册，对为未经授权组织的宗教活动提供设施的业主处以罚款，而且限制与海外宗教机构的联系。该条例规定宗教团体在出国旅行之前必须获得批准，并禁止“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对此，有关当局说，这包括流亡国外的藏人，特别是达赖喇嘛。该条例将宗教学校置于与宗教礼拜场所相同的监管之下，并对宗教团体进行商业活动或投资施加了限制，包括限制他们可能接受的捐款数额，从而限制了其财产所有权的规模和发展。含有宗教内容文献的出版和发行必须遵循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的指导方针。宗教材料的出版还必须符合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的指导方针。

条例还规定宗教活动“不得危害国家安全”。虽然条例规定宗教团体必须遵守法律，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反对“宗教极端主义”，但对“极端主义”一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维护统一和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措施包括监督团体、个人和机构，并建议采取惩罚措施，如暂停团体活动和吊销宗教教职人员证书等。该条例规定，宗教团体的网上活动必须获得省级统战部的批准。

自1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反间谍安全防范条例》生效。根据此条例，在西藏自治区的“反间谍”包括防范和制止“民族分裂”、“民族纠纷”及“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等活动。

国家宗教局在1月18日颁布了名为《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的新法规，5月1日起施行。该法规规定所有宗教教职人员宣誓忠于中共和社会主义，并建立了一个“宗教教职人员”数据库以跟踪他们的表现。该法规第三条称宗教教职人员“应当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与社会稳定”。第六条的一部分称宗教教职人员应“抵制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该法规还要求“进入宗教场所应当严格把关，核查身份并登记造册”。该法规还规定宗教组织和机构需对个别宗教教职人员的行为负责。第七条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应当“注重提升自身素质，提高文化、道德素养，研究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并融入讲经讲道中，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发挥作用”。

国家宗教局在9月1日还颁布新的规定，要求所有宗教学校教授习近平思想并坚持“宗教中国化”。2020年的《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学校课程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治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确保学生“坚持正确方向”。

禁止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参加宗教活动和接受宗教教育，即使在由宗教团体经营的学校中也是如此。这些规定的执行和实施在区域之间和区域内差异很大。一项法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利用宗教来妨碍国家教育体系，而且学校中不得进行任何宗教活动。这些规定实际上禁止藏族青少年在年满18岁之前进入寺院。

2020年1月，政府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这些条例规定在西藏各级政府以及学校、私企、宗教中心和军队中为非藏族人提供“平等机会”。

2018年出台的一项政府政策规定西藏的僧人和尼姑接受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培训。僧尼不仅必须展示在宗教学习方面的能力，还必须表现出“政治上靠得住”，“品德上能服众”，而且“关键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

自焚（自焚作为抗议的一种形式）被视为杀人。如果亲属、学生或信徒选择自焚，其家人、老师和宗教领袖都可能被指控为杀人的帮凶。

宗教团体如果要建立正式的礼拜场所，必须在修建设施之时和在那个场所首次进行任何礼拜活动之前分别得到当地统战部的批准。宗教组织在审批过程中必须提交数十份文件才能进行登记，包括其宗教活动的详细管理计划、详尽的财务记录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没有经过正式登记注册程序的宗教团体不可以合法拥有固定的设施或礼拜场所；他们每次要预订礼拜场所（例如租用酒店或公寓）都必须分别获得中共有关当局的单独批准。无论是通过正式登记手续，还是每一次活动申请批准，未经事先批准在一个场所进行礼拜活动均被视为非法宗教活动，可能会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

个人要加入宗教教派必须向中共西藏委员会提交申请，而该党委有权拒绝任何申请。法规还要求僧尼在前往西藏境内其它地区或者县级城市进行“修行”、从事宗教活动、学习或讲经之前，必须先获得原住地和前往地的县官员批准。西藏以外的藏族自治州也有类似的法规。

在中央层面，中共中央委员会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和统战部负责制定和实施宗教管理政策，这些政策在五个国家批准的爱国宗教协会支持下执行：即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佛教协会）。在地方层面，要求党的领导和统战部、国家宗教局以及佛教协会的下属机构协调在各寺院里宗教政策的落实。

中共党员和退休政府官员，包括藏族党员和退休官员，都必须是无神论者，禁止参与宗教活动。被发现属于宗教组织的中共党员将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包括解雇和开除党籍。

**政府行为**

人权组织和媒体报告当局在藏区实行严格的电话和网上通讯管控。这导致一些前些年发生的失踪、拘捕、关押和死亡事件在今年才被知晓。由于政府政策限制进入西藏地区和新冠肺炎疫情，获得信息和旅行受到限制，致使难以确定因宗教信仰或宗教从属关系而被关押的确切人数，也难以确定对他们的指控或评估他们遭受虐待的程度和严重性。由于宗教往往与民族特征紧密相联，因而很难把许多事件归类为仅仅是宗教事件。

《台湾时报》报道，“再教育营”的官员提供不合标准的膳食，使妇女忍饥挨饿，一些妇女因营养不良致死。一名叫阿迪的幸存者说，她因为向提出“性贿赂”的监管看守所的汉族官僚提供服务而获得额外的食物。

总部在印度的非政府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TCHRD）报告说，在2019年9月，当局拘捕了西藏那曲州塔楚乡居民诺桑，因为他拒绝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的“爱国主义教育”。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后来报告说：“2021年5月得知诺桑在2019年被捕一周后，在关押期间死亡。”一个消息来源告诉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诺桑是因为遭受当局毒打和酷刑致死。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1月报告说，西藏僧侣丹增尼玛2020年10月从拘留所释放后，在当年12月或次年1月因拘留期间受到的伤害去世。人权观察说，尼玛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温波寺，起初是在2019年11月因分发呼吁西藏独立的传单和喊口号被捕。当局在2020年5月将其释放，但在8月又因他在网上发布第一次被捕的消息而再次拘捕他。消息来源告诉人权观察，尼玛在第二次被释放时不能说话或行动，而且有急性呼吸道感染。消息来源认为这些是他在关押期间被打、严重的营养不良和被虐待的结果。

总部在印度的藏语媒体《故乡网》5月报道，诺桑（不是姓）是一名在2019年因拒绝参加政府组织的政治再教育培训而被与世隔绝关押的男子。据称他是因受酷刑而死。据《故乡网》报道，诺桑2019年被当地安全官员关押期间死亡，但这些官员直到[今年]5月才披露他已死亡。当局说诺桑为了逃避债务而自杀，但一个消息来源说他在被捕时并没有债务。

本年度中没有有关藏人以自焚形式抗议政府政策的报道。相比之下，2020年也没有，2019年有一例。1月，藏人行政中央报告了2015年发生的一例自焚事件，这次事件此前没有报告过。这位叫许莫的男子在2015年9月17日在西藏那比如县夏曲镇自焚，当时他26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称，从2009年到2019年12月，共有157名藏人自焚，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对西藏的占领和中国统治下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蹂躏。一些专家和当地消息人士将自焚事件的减少归因于当局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并担心自焚者的家人和同伴可能会受到惩罚，包括被指控为杀人帮凶。

更登确吉尼玛是被达赖喇嘛和大多数藏传佛教人士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自1995年被中国当局强迫失踪以来一直下落不明。据报道，尼玛和他的父母被绑架时他只有6岁。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重要领袖。4月25日，流亡藏人庆祝尼玛32岁生日。维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他，并允许他恢复宗教职责。

自由亚洲电台（自由亚洲）8月报道称，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统计，此前三年在藏区有至少40起强迫失踪案件发生。受害者包括佛教教职人员、作家、艺术家、农民、社区领袖、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称这些失踪案件中的大多数人被当局说成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泄露国家机密”案件。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说，“每年仍然都有藏人失踪，这破坏了家庭生活和社区凝聚力。”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西藏观察的研究员白马嘉乐对自由亚洲电台藏语节目说：“有这么多藏人被中国政府逮捕，然而他们的下落和被捕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都没人知道。”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3月23日，僧人仁青持真的家人得知当局在不公开审判后判决他四年半徒刑。他在审判中不让他使用律师服务。当局在2019年因涉嫌“分裂国家”活动逮捕持真并将他与世隔绝关押两年。他妹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在他被捕之前，当局曾警告持真停止表达他的想法并停止撰写一系列有关西藏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文章。在本年底，持真被关押在四川省的绵阳监狱。

消息来源称，截至本年底，尚有几名僧侣下落不明。这些人包括多杰饶登，他于2018年9月抗议政府限制年轻人成为僧侣的政策被拘捕；丹增格勒则因为抗议当局拘捕多杰而被捕；洛桑塔克于2018年被捕，在2021年7月30日被判入狱四年，罪名不详；洛桑多杰在2018年8月被捕；还有牟尼，警方于2017年底将他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河支寺带走。

消息人士告诉媒体，当局经常对藏人囚犯进行身体虐待。自由亚洲电台9月报道，当局在藏传佛教僧人塔布吉嘉措服刑12年后将他释放。他在2008年因在拉萨参加抗议被判刑15年。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由于监狱里的严厉对待，他的视力和整体健康情况都十分衰弱。”在他被捕的第一年，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2月，《台湾时报》报道称，“再教育营”中的监狱工作人员经常对包括尼姑在内的妇女以毒打和用牛电棍电击的方式施以酷刑。一个名叫仁增贡桑的西藏妇女因参加抗议被拘捕。她报告说她戴着手铐，被脱光衣服用电棍电击，用竹棍打，经常打到竹棍被打断。其他西藏妇女报告说，狱警把她们吊在墙上，有时是头朝下，并用电棍电击。据《台湾时报》报道，一位名叫阿旺次巴的尼姑直到两个肩膀脱臼才被从吊打的姿势放下来。另一位名叫阿旺强巴的尼姑报告说，她被用椅子和棍子打，并且被用牛电棍电击。几名幸存者说狱警放狗咬囚犯。一位叫坚赞曲珍的尼姑报告说，狱警穿着有铁钉的靴子踩她们的手，踢她们的脸和腹部；将装满屎尿的桶放在她们头上并用棍子打这些桶；踢她们的乳房和生殖器直到出血；还用点燃的香烟烫她们。

据《台湾时报》报道，监狱当局经常用性来贬低尼姑并强奸她们。一个消息来源说，尼姑被告知她们的身体“属于党”而不是属于庵堂，并评论说这些不仅是暴力行为，而且一旦被强奸，尼姑会认为她自己违反了禁欲的戒律，不配继续做尼姑，所以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还俗生活。一名尼姑说，狱警强迫尼姑们裸体匍匐在僧侣面前。一位幸存者报告说，狱警将电线绕在她的乳房上电击她。另一人报告说狱警在妇女裸体时放狗咬她们。

《台湾时报》报道，在拉萨的一个监狱，当局因25名妇女穿藏族服装而不是监狱制服庆祝藏历新年而强奸了她们。

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当局有时将身体不好的囚犯在刑满前释放。自由亚洲电台3月报道，岗布日杰尼玛因参加抗议需要服刑10年，但在2月被提前一年释放。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释放是由于岗布因在狱中被打和其他形式的身体虐待而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所致。

美国之音报道，2月17日，当局因三名青少年创建了一个名为“白岩山俱乐部”的微信群而拘留了他们。这个名字指当地一个藏传佛教的神。据美国之音报道，这些年轻人建立了这个聊天群庆祝2月12日到14日的藏历新年。但是当局称这个群违反了政府要求所有微信群在地方监管机构登记以便政府监督聊天内容的规定。美国之音报道，警察殴打了这三个男孩，造成一人腿被打断，需要住院。

根据人权观察报告，一名叫贡却津巴的导游和环保活动人士2月6日在拉萨的一家医院去世。他在不到三个月之前在他的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从监狱转送到那里。当地消息人士说他大脑出血并且已经瘫痪。当局在2013年拘捕津巴，指控他向外国媒体传递他所在地区有关环境和其他事件抗议的信息，并因泄漏“国家机密”给他判刑21年。在贡却津巴去世之前，他的家人从他在2013年被拘留开始就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说：“贡却津巴的死是又一个被错误监禁的西藏人被虐待致死的严酷案例。那些对肆意拘留、酷刑或虐待负有责任的中国各行政当局应对拘押期间有人死亡负责。”

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12月公布了一个政治犯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记录，自1990年以来，当局拘留了5500名藏人政治犯。美国之音报道，当局释放了其中的3000多人，但截至年底仍继续关押1800多人。

自由亚洲电台3月报道，政府在拉萨和西藏与印度边界沿线展开了一波逮捕行动。被逮捕的人的名字没有报道，但自由亚洲电台表明，这一波拘捕发生在3月开始的一些敏感的政治纪念日的前一个月，包括3月10日是1959年藏人反抗中国统治起义的纪念日。

4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四川省官员逮捕了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果喜饶嘉措，他还是一位知名的西藏教育家和作家。不过在他被逮捕时他的下落不明。非政府组织西藏观察在12月报道，当局在11月以“煽动分裂”为名秘密将果喜饶嘉措判刑10年。据西藏观察消息人士称，地方当局没有透露他被判刑的确切日期或是他服刑的地点。当局此前已两次拘留嘉措。1998年到2002年因拥有一幅达赖喇嘛的肖像被关押，2008年到2009年被关押，原因不详。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他所写的支持达赖喇嘛的文章很知名。7月，四名联合国专家，包括宗教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就有关“两名西藏佛教徒，果喜饶嘉措先生和仁青持真先生涉嫌被任意拘禁和强迫失踪”致信中国政府。政府在9月的回信确认了两人被监禁。

自由亚洲电台4月报道，当局在3月和4月之间在四川省逮捕了六名藏人作家、僧人和前政治犯。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当局在2月和3月之间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逮捕了岗吉志巴加、赛朗、贡布尤珠和岗次仁卓玛，还有两名不知姓名的人，但由于中国对信息的“封锁”，没有任何关于这些人的罪名或是他们下落的消息。截至本年底，仍没有更多有关他们的拘捕或关押的信息。

4月，藏人行政中央运营的网站Tibet.net报道，一个在印度达兰萨拉的代表性民间支援组织报告，几名居住在西藏那曲市比如县的藏人被逮捕。他们涉嫌通过电话和社交媒体与境外藏人联系。该报告指认被捕的人之一的名字是亚金（音），但未能了解到其他被捕的人的身份。据非政府组织自由西藏说，比如县是西藏管控和军事管控最严厉的地区之一，管控早在2013年5月就开始了，当时居民抗议与政府关联的公司在他们的圣山那格拉-赞巴启动开采活动。

西藏观察报道，当局7月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关闭了一个私立的藏语学校，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之后在8月，他们逮捕了在该校任职时间最长的教师之一仁钦吉。当局指控仁钦吉煽动分裂主义。当地消息人士说学校的关闭是出于政治动机，因为该校教学使用的第一语言是藏语，而且为学生提供基于西藏文化的学习。

人权组织报告说，中国当局继续将分享或拥有达赖喇嘛的照片或语录定为违法。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局8月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温波县突击检查了一些住宅，并且因为拥有达赖喇嘛的照片逮捕了19名僧人和40名信众。三天后，警察召开了18岁以上当地居民必须参加的会议。一名消息人士说，“会议的重点是警告大家不要保留任何达赖喇嘛的照片或是在手机上分享任何消息。”之后，警察搜查了镇上的住户看是否有违禁照片。当局还以清洁为借口检查了一所老人院，没收了许多违禁照片。他们把习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照片给老人院的居民挂在原来放违禁照片的地方。据消息来源透露，在这次会议和突击检查之前，当局今年早些时候在温波镇强迫藏人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保证不拥有或传播达赖喇嘛的照片，否则罚以刑事起诉及拒绝发放国家补助。Tibet.net网站也报道了此事，称当局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在温波镇拘捕了121名藏人，并强迫他们接受政治“再教育”。僧人在社交媒体上参加非正式的藏语课和保护藏语的小组后被拘捕。据该报道称，当局后来将被捕的人释放，只有三人除外。

据自由西藏和《故乡网》报告，10月底，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判决前僧人及作家图丹洛桑伦珠（以笔名迪拉丹知名）四年徒刑。当局2019年6月在四川省成都市逮捕了拉丹。在他被审判之前他一直与世隔绝关押。伦珠曾是拉萨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人。他写书和随笔文章批评政府政策。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报道，检察官用他写的书《消极抵抗的艺术》作为证明他有罪的证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说，“‘扰乱社会秩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罪名，被党国用来消除异议的声音和保留审查制度的文化。”

自由西藏报告，3月14日，青海省杂多县当地警察因四名藏人爬山、祈祷和烧香逮捕并审讯了他们。此外，警察还没收了他们的身份证，并检查他们的手机看他们的微信帐号是否按要求在政府登记过。警察逮捕了其中一人。他们警告这四人的父母及亲属说，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他们将对此负责。

自由亚洲电台在12月报道，当局在四川省阿坝县判决藏族僧人洛桑赤列5年徒刑，因为他“传播达赖喇嘛的书和讲义”。据该报道称，当局在7月逮捕洛桑，因为他传播有关达赖喇嘛的信息，但他们直到9月才告诉他的家人他已被逮捕和审判。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当局不准他与律师接触。据消息人士说，洛桑此前曾因类似的原因被拘留过。

人权观察在7月的一份报告指出，当局在2019年突击检查了西藏定日县协格尔镇的当卓寺，殴打了几名僧人和村民，并拘捕了大约20人。据人权观察报告，这些僧人被拘捕的原因包括涉嫌与境外藏人交换信息、因2015年在尼泊尔发生地震而向他们在尼泊尔的姐妹寺院的藏人捐献抗震救灾资金、以及拥有与达赖喇嘛相关的照片或文献。该报告说，在一次秘密审判后，4名僧人被判5到20年不等的徒刑，“判决极为严苛”。

据多个消息来源称，政治犯，特别是僧侣和尼姑，常常被当局强迫表演赞美中共的爱国歌舞，并观看宣传电影。如果参与者似乎不感兴趣，当局会认为这是对国家不忠的证据，就会严厉惩罚，包括殴打，并且不准他们接受探监的家属送来的食物或衣物等礼物。

媒体和人权组织报告说，藏区的地方官员明确表示，根据全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计划，支持达赖喇嘛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人可以被逮捕，藏民被告知要告发任何“与达赖集团勾结的人”。

政府继续限制佛教寺院和其他机构的规模及实施2016年开始的从寺院驱逐僧人和尼姑的行动。尽管难以有确定的数字，但据人权团体和当地的消息来源称，2016年至2019年间（可找到的最新信息），当局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佛学院驱逐了6000至1万7000名藏族和汉族的僧侣和尼姑。据当地消息人士说，当局继续禁止僧人和尼姑回到这些地点并重建这些场所。被逐出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佛学院的僧侣和尼姑被特别禁止转到其他寺院继续他们的宗教教育。

自由亚洲电台8月报道，当局关闭了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藏传佛教寺院红城寺并驱逐了数目不详的尼姑和僧侣。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该事件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红城寺（又名御令宝塔寺）的僧人举着写有“逼僧还俗，国法不容”的横幅及其他抗议口号。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视频显示尼姑在被强行离开时“哭声哀声一片”，也有其他人大喊“别呀！别呀！”和“都录下来！”当地官员否认发生过这次行动。一位身处中国境外的评论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政府“正准备在中国大部分是汉族的地区消除所有藏传佛教寺庙”。

在这一年中，政府据报继续执行将以前游牧的藏人安置在政府补贴的住房里的政策。在许多地区，这些地点都位于乡镇和县政府所在地附近，或者沿着主要道路，附近没有寺院供被安置的村民进行礼拜。政府禁止未经事先批准在这些地区建设新的宗教场所。传统上藏人的村庄通常聚集在寺院周围，寺院向社区成员提供宗教和其它服务。许多藏人仍然认为这种安置措施是中共和政府企图淡化宗教信仰、削弱寺院和社区之间联系的努力。

自由西藏报告说，在10月21至22日，安全官员以18岁以下的人不得加入寺院为名强制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夏琼寺驱逐了30名十几岁的学生僧侣，从当地另一个迪萨寺（音）驱逐了50名十几岁的学生僧侣。他们将这些年轻人带回家，并告知他们不能再穿僧侣的长袍或在寺院学习。自由西藏说：“这样的政策限制年轻藏族佛教徒接触他们的文化遗产，因为寺院是学习藏语和西藏文化的必不可少的资源……而且，学生是寺院结构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们辅助高级僧侣完成他们的职责以确保寺院的顺利运营。”

国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告说，政府继续执行2019-2023五年计划，通过强调对中共和国家的忠诚来使中国的佛教中国化。该计划包括藏传佛教，由国家操控的中国佛教协会参与。中共在2020年颁布的《宗教团体管理办法》对于将所有宗教，包括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管理程序进一步正规化，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正确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

天主教媒体天亚社报道，在5月1日生效的新的国家宗教局法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对宗教教职人员的培训、挑选和监督增加了更多意识形态控制，包括强调忠于中共和社会主义。2月11日，网上出版物《寒冬》发表了对新法规的英文翻译和分析。该出版物跟踪中国的宗教自由和践踏人权情况。据《寒冬》报道，在政府数据库登记很“复杂”。没有登记在数据库中的人，如果声称自己是宗教教职人员，属于犯法。不能获得“宗教教职人员证书”的人包括任何不属于五个官方认可的爱国宗教协会之一的人，包括中国佛教协会。《寒冬》称，申请人必须证明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据天亚社报道，根据新法规，“在没有获得[中共]许可的情况下，活佛……不能从事任何本职活动，也不被视为真正的转世”。《寒冬》说，这些法规制造了“一个奥威尔式的监视系统，并加强了对所有宗教教职人员已经非常严格的控制”。

美联社报道，习主席6月到访拉萨，纪念中国控制西藏70周年。这是他十几年以来第一次到访西藏。美联社报道，在他到访期间，一个公开展示的标语写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在被视为西藏最神圣的寺院，也是藏传佛教最神圣的圣地之一的大昭寺，最高级别的僧人拉巴说，达赖喇嘛不是这个寺院的精神领袖。在问他谁是精神领袖时，他说：“习近平。”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9月27日至30日，在青海省西宁市青海佛学院召开了一个500多僧侣和尼姑参加的会议。包括宗教人物和藏传佛学院及佛教大学的学生在内的与会者得到指示，藏传佛教寺院和学习中心必须开始将课堂用课本从藏语翻译为普通话。自由亚洲电台称这一新政策是为了鼓励藏传佛教中国化而设计，并更加有力地推动政府将普通话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努力。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仍不清楚该政策是否包括逐渐将数以千计经典藏文佛经翻译成中文。这些佛经很多是原来从梵文翻译而来。拉卓格西是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的馆长。他说，普通话无法交流佛教教义的全部含义。他说：“这个计划背后毫无善意。”在《华尔街日报》11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一位在美国居住的藏人学者指出：“最终目的是让未来的喇嘛和僧侣只通过中文学习佛教——为消除藏语铺垫道路。”

5月21日，中国政府发布一份白皮书，声称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中国要负责选择藏传佛教领袖，包括达赖喇嘛。政府说它应该控制重要的藏传佛教传统，包括哪位喇嘛可以“被授权”成为转世，而且将确保活佛转世“按照法规规章、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有序开展”。此外，白皮书称将要求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据报道，西藏政府继续对藏传佛教宗教文物的使用保持严格控制，并宣布这些文物、宗教建筑物和宗教机构是国家财产。消息来源继续报告说，虽然当局允许进行一些传统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但他们继续对宗教领袖的活动和普通信众的宗教聚会保持严密的控制，将许多宗教活动限制在官方指定的敬拜场所，并且防止僧侣前往各个村庄参加政治敏感的活动和宗教仪式。宗教人士和普通信众经常报告说，他们依然很难前往自己家乡地区以外的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寺院。得以远行的人说，他们在主要寺院周围遇到路障和警察检查站，安全人员经常检查他们的身份证并拒绝非当地居民进入。希望到寺院里探望家人的藏人说，他们经常被拒绝或限制探视。当地消息来源称，当局对他们的行动也有类似的限制，并说由于有警察检查站和害怕被拘留，使他们不敢参观寺院和参加宗教活动。2008年拉萨和其它地区，例如四川省阿坝县的抗议之后，许多僧侣被逐出寺院，他们还没有回来，有些是因为政府禁止他们返回。

自由西藏7月报告说，为迎接在7月的中共建党100周年纪念日，中共2月在全国开展“讲党史”活动。作为这场活动的一部分，中共派党员干部访问家庭、寺院和学校，传播“正确的”党史和政策。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中共官员和警察访问家庭和公立学校，传播中共的宣传。5月，中共官员在西藏贡嘎县多杰扎寺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僧尼被要求在一个写着“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好僧尼”的横幅上签上他们的名字。6月底，中共官员在西藏拉萨市、昌都和那曲自治州的寺院开展宣传活动纪念建党100年和中国统治西藏70周年。

消息人士称，中国当局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由，继续限制青藏高原上的许多主要寺院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当地消息人士向自由西藏确认，本年内许多藏传佛教寺院和其他宗教场所被关闭。当局说这是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自由西藏在1月报告说，政府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由发布指令，禁止所有“外人”进入喇荣寺的所有地区（曾是藏传佛学院，但被当局摧毁），并严禁在那里进行大型集会和举办宗教活动。其中许多消息来源说，有关官员利用疫情限制措施防止人们参加宗教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局以疫情防控措施为由取消了2月的藏历新年公众庆祝活动和祈祷仪式，并关闭了拉萨很多主要宗教场所，包括布达拉宫、哲蚌寺与色拉寺。当地消息来源说，在四川省甘孜州新隆县的藏人还被禁止进行社交集会或参观寺庙。当局并在藏历新年开始之前在青海省藏民居住地区限制旅行。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藏历新年之前，当局以“社会稳定”和“卫生”名义在青海省果洛自治州的果洛县和玛多县在晚上10点施行宵禁。据消息人士称，安全人员被派到饭馆、酒店、网吧和“所有娱乐场所”。警察检查身份证。消息人士说：“任何在宵禁之后被抓到的人都有被惩罚的风险，包括坐牢和严酷的身体虐待。”

当地消息人士称，政府继续压制被视为政治异议表达手段的宗教活动。有报告称，地方当局再次下令许多寺院和普通信众不得庆祝或组织任何公共集会庆祝7月6日达赖喇嘛诞辰86周年，或纪念1959年3月10日西藏起义，或2008年3月14日整个青藏高原爆发动乱的周年纪念日。与之前的年份一样，西藏当局在此期间禁止僧侣和尼姑离开他们的寺院和尼姑庵，朝觐地点受到严格的警察管制。当地消息人士报告说，有关官员访问了西藏、四川、青海和甘肃省的寺院，告诫那里的工作人员不要在达赖喇嘛生日那天接待“外来访问者”。消息来源说，官员们继续敦促藏人报告到这些地区来的外国参观者的情况及其他“可疑活动”。这项政策已经执行了很多年。

据西藏观察报道，政府在四川省阿坝县禁止了所有在8月8日庆祝格尔登寺第11世格尔登仁波切，洛桑丹增晋美益西嘉措仁波切80岁生日的活动，包括宗教活动、社交事件和私人聚会。格尔登仁波切现居印度。这个禁令包括格尔登寺及其在阿坝的关联寺院，还有邻近佐格地区的村庄。消息人士告诉西藏观察说，当局对社交媒体施加了特别限制。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道，中共在4月向西藏的中共党员发布了一份新的六点行为准则，明确禁止党员公开或私下保持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尽管有报道很多当地的政府官员有宗教信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这个行为准则有“很大意义，因为可能是第一份党的规章明确且全面详尽表述了在西藏的党员禁止的具体宗教信仰形式，”包括戴念珠、转发或“喜欢”网上的宗教内容、及绕行山和湖。这个行为准则还要求中共党员积极向自己亲属宣传党的反宗教立场，不要在家中设佛龛或悬挂宗教图像，并在邀请宗教人士为传统场合如婚礼或葬礼举行仪式之前申请党的批准。西藏地区政府对到印度进行朝圣或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在国外居住的藏人那里学习的中共党员进行了惩罚。

5月，媒体《故乡网》报道，当局继续禁止藏人和公务员参加萨嘎达瓦节期间的宗教活动。这是为期一个月的节日，标志着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涅盘。消息人士称，当局威胁说，违反禁令的人会承担“严重的后果”。当局在该节日整月最神圣的这一天，萨嘎达瓦节的第15天加强了对大昭寺建筑群的监视和出入限制。

据当地消息人士说，在8月6日至14日在拉萨庆祝雪顿节期间，警察对治安严防死守。大批身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察监视朝拜的人群。有关官员在节日发表讲话，谴责达赖喇嘛，敦促与会者忠于中共。

10月，总部位于美国的媒体《国会山报》报道，为了增加可以进入拉萨大昭寺参观的汉族中国游客数量，当局继续阻止或以其他方式防止藏人进入该寺院。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自5月18日开始，当局允许朝拜者从早8点到上午11:30进入寺院，而主要从中国其他地方来的游客则可以从中午12点到下午7:30之间进入参观。自由亚洲电台10月25日报道，当局以新冠肺炎防疫为由大幅限制政府职员、学生、退休公务员和朝圣者进入布达拉宫（达赖喇嘛故居），但是如果汉族游客出示新冠肺炎检测阴性的检测报告证明则允许他们进入参观。

8月，政府再次禁止在前色达五明佛学院旧址举行一年一度的德钦舍珠法会。当局说，发布这个禁令是因为人太多，担心新冠肺炎传染。这个禁令标志着政府连续第六年禁止举办这个已有23年历史的法会。

据当地消息来源，四川、青海和甘肃省当局再次警告藏区主要寺院，包括拉卜楞寺、查理寺和博拉寺，举行特别活动或庆典的人会面临未说明的“严重后果”。

地方当局继续援引有关维护国家统一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法规监视个人、团体和机构，并惩罚达赖喇嘛等宗教领袖的信徒。3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一份报告，题为《高于佛教的党：中国对藏传佛教寺院和尼姑庵的监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称对寺院的监控通过一个包括人为和电子手段的复杂网络施行。据该报告称，“在寺院部署的手段达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而且目的在于使寺院没有任何政治影响。不仅人身活动被监控，而且这种制度式的方法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控制扼杀寺院的内部世界。”该报告称：“对寺院的严密监控已经导致僧侣因没有遵守官方政策而被驱逐，或者由于官员不断骚扰给僧人制造的令人无法忍受、令人窒息的环境而致使僧侣自愿离开。”

有报道称，党的领导人和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的下属机构以及国家控制的中国佛教协会继续在藏区寺院中派驻党和政府官员，包括安全人员。省、地、县和地方政府继续在许多寺院和寺庵所在地或旁边设立派出所或警务室。尽管没有最新的统计数据，但消息来源估计，2018年有1万5000多名政府雇员驻扎在大约3000座藏人寺院里工作。

人权团体和当地消息来源称，当局继续在寺院公开安装摄像监控系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报告《高于佛教的党》称闭路电视摄像头被“大规模部署在寺院内和寺院外的附近地区以监视寺院。这是执法机构使用数量最大的单一便捷工具来维持对寺院的监视，保留积累的记录，并先发制人地粉碎任何异议的迹象……寺院内永不眨眼的摄像头的存在给寺院制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该报告包括了一张四川省阿坝自治州格尔登寺监控室的照片，显示电子屏幕连接着35个分布在寺院周围的摄像头。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报道，当局在整个拉萨开设了“安全中心”或“便民“警务站。自由亚洲电台将安全中心的作用描述为“通过监视来压制当地原住民”。

据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多个消息来源称，那里的官员继续保留一份自焚者亲朋好友的监视名单，以防止他们与国际访客见面和交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取消了他们的公共福利。

3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在西藏全境成立了697个“纪律委员会”，包括1960名“监察员”负责监视乡镇和乡村地区的居民。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任何从其他地方到这些地区的藏人必须出示一份有旅行许可印章的文件。”自由亚洲电台说当局维持“在该地区对信息流通的严格控制，逮捕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新闻和观点及与流亡亲属联系的藏人”。

美国之音3月报道，当局继续在西藏监控并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和虚拟专用网络。消息来源说，安全官员会检查藏人的手机，而且经常威胁他们如果与在印度或其他国家的亲属保持联系就会断了他们基本的社会服务。在报告《高于佛教的党》当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对僧侣在网上和社交媒体活动的监视“深深地影响了寺院社区，因为他们是在抵制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暴行的最前线……僧侣因他们发的信息被认为‘非法’或是分享达赖喇嘛的照片或是谈论藏语的现状而面临被捕”。

自由亚洲电台在11月报道，当局给曾被关押的藏人发放政府的手机，特别是原来的政治犯。这是更好地监视他们行动的手段。一名前犯人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政府发放的手机中装有跟踪设备，可以知道你的位置以及和谁见面。这些手机中的SIM卡直接连接到一个政府控制办公室。”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报告，当局强迫青海省的一些前藏族犯人戴脚环，它们可以监视行动、给对话录音，在人越过设定的界限或试图对脚环做手脚时，脚环可以报警。

人权团体表示，当局继续利用2020年1月份通过的《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将汉族文化强加给藏族人，并鼓励藏人互相告密。作为政府在1月发布的《西藏自治区反间谍安全防范条例》的一部分，当局使用被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描述为“欺骗性语言”说服藏人，他们的邻居和外国人是国家安全的威胁。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道，“通过广泛使用监控技术，对藏人个人告发他们邻居的压力增大了。如果摄像头和人脸识别算法发现被认为可疑的活动，那些目睹活动却没有报告的人同样受到怀疑，可能面临时间很长的审问。”

詹姆斯敦基金会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新疆的军事化职业培训制度来到西藏》指出，政府采用“网格化管理”和“双联户”制度来监视和控制社区。在网格化管理系统下，街道和社区被划分为较小的单元，由专门指定的行政和安全人员维护居住在这个网格中每个人的详细数据库。“双联户”制度“使每10个‘双联户’家庭互相告密，将普通公民圈入了国家广泛的监视机制”。Tibet.net3月报道，当局给告密邻居是“极端主义分子”或“分裂分子”的人以金钱和其他形式的报酬。有关被认为不忠于政府的社交媒体用户的线索如果导致逮捕，最高奖金30万元人民币（4万7000美元）。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是西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六倍。

据人权组织和媒体的消息，当局经常检查手机中是否存有达赖喇嘛的照片和其他被视为敏感的内容。有报道说，当局在发现这种材料之后，会对普通藏人进行多年监视。

在报告《高于佛教的党》当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僧尼“同样受到改变他们意识形态基础的压力。他们本来的意识形态是基于佛教哲学。当局要求僧尼通过自我检查和相互批评‘改正’他们的想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公布了僧人学习中共思想的照片。该报告称：“警察积极活动，迫使僧尼不断自问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有可能会被视为非法。”

消息人士称，当局强迫寺院展示中共领导人的画像和国旗。

人权组织和当地消息来源称，本年内，当局继续扩展要求家庭用知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和习主席像取代家中的达赖喇嘛和其他喇嘛像的做法。以前，这项政策仅对那些根据扶贫计划依赖国家支持的家庭是强制性的。据当地消息来源称，当局要求西藏和藏区所有寺院、学校和办公室展示中共领导人的照片。消息人士称，当局进行检查，以检查大家是否照着做了。

除了禁止公开对达赖喇嘛表示崇敬，包括展示他的照片，政府还继续禁止更登确吉尼玛的照片。达赖喇嘛和几乎所有藏传佛教徒都将其视为十一世班禅喇嘛。在西藏的一些县，展示达赖喇嘛像的惩罚包括被逐出寺院。当地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监视宗教活动的政府各部门官员到访藏人的学校，警告老师和学生不要保留或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

当地消息来源报告，“20条不准”仍然有效。西藏自治区2019年制定了这些法规，禁止僧侣使用社交媒体“煽动颠覆国家，侮辱、诽谤他人，为宗教极端活动提供资金，向境内外组织、机构、个人非法提供国家未公开的信息，或下载、存储、发布、传播非法信息”。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室还宣布，那些滥用社交媒体的人可能会被判处长达8年的徒刑。

当局加大了对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的监控力度并加强了使用的限制。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报道，8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另外九个党和政府部门和机构联合召开发起打击网上“非法”活动运动视频会议。与会的其他机构包括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技术部、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中华全国记者协会。在宣布这场运动的一周之内，西藏侨民消息来源报告说，在随机抽查私人电话和在微信上发布的内容之后，一些藏人被捕。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7月20日，警察在四川省阿坝县逮捕了阿坝河支寺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康美，因为怀疑他在微信上开展政治敏感的讨论。据当地消息来源说，康美仅仅是因为他在微信上背诵祈祷文被逮捕。该消息来源说：“他没有说任何关于政治问题的内容。”

自由西藏1月报道，中国当局在西藏那曲市将一条藏语经文更换。这条用藏语写的“莲花是宝”的经文被写在山的一侧，字体大到从那曲达仁机场降落的飞机上可以看到。当局将其改换成中国国旗和用中文写的“祖国万岁”的标语。伴随这篇文章的是更改前后的从空中照的照片，展示原来经文所在的地点和更改后的内容。自由西藏说，西藏各地曾经到处可见藏语经文，但是当局正系统地在整个地区更换这些经文。

自由西藏报告，10月底，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当局命令炉霍寺官员拆除该寺院的甘丹热丹朗杰林学校，声称这个建筑违反当地土地使用法规。这个学校教授青年僧侣藏语、语法、普通话、英文、中观和其他佛教教义。当局命令130名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学生回家。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2月12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当局摧毁了一尊30米（99英尺）高的佛像。当局称这座在2015年修建的佛像未获得县政府批准。他们还烧了佛像周围的经幡，毁坏了转经筒。自由亚洲电台后来报道，当局在拆毁佛像之前从炉霍县的甘丹寺逮捕了4个人，包括方丈、他的助理和两名僧人。

多个消息来源报告，政府继续干预普通信众和儿童的宗教教育。西藏当局要求僧侣取消所有孩子的课程，并警告说，如果继续上课，僧侣和父母的社会保障福利可能会受到限制，或者他们可能被拘留。西藏以外的一些地方也实行了宗教教育禁令。

西藏行动中心（TAI）12月发布报告说，近80%的西藏学龄儿童（大约80万学生）被强迫到国家开办的寄宿学校上学。该报告称，政府在西藏拥有“一个庞大的殖民寄宿学校网络。学生在那里与他们的家庭分离并接受高度政治化的教育，主要使用中文”。报告作出结论说，这些学校是“一个同化计划的基石，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推动，旨在通过消除民族差异先发制人地消除对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威胁”。西藏行动中心的报告列出了政府企图通过一个消除“所有‘藏人特征’，仅保留象征性元素”的教育系统“重塑”西藏青年的大纲。该报告称，寄宿学校制度是中共企图将藏人归入中国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核心。

西藏行动中心报告称，由于政府在过去十年努力消除寺院作为藏人接受教育的一个选择，藏人父母“因缺乏其他可行选择而不得不送他们的孩子去寄宿学校”。西藏行动中心报告还出具了证据，证明政府使用罚款和威胁强迫父母将孩子送到国家办的寄宿学校。西藏行动中心报告指出，藏人父母做出结论认为，送孩子去这些学校是他们的孩子能够“在深刻变化的世界中活下来”的唯一办法。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3月报道，西藏法规要求学校按照国家要求学校课程需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意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确保学生“坚持正确道路”的法规，将国家安全教育、反间谍等“安全知识”融入在校学生的课程。

当地消息来源报告，在这一年中，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省级官员再次禁止所有未成年学生在学校放假期间参加宗教活动。学校官员再次要求学生签署保证书，表示他们在暑假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4月开始，在西藏那曲自治州的学校实行了禁止学生家长在校内携带念珠、转经筒或其他宗教物品的规定。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新规定说“学校是培养和生产社会主义学者的地方，不应被用来当作遵循礼仪和传统的地方”。该消息来源说，在建党1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当局“加强了在西藏区县、乡镇、寺院和学校传播党的意识形态的努力”。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地消息来源担忧在藏人学校里对使用藏语的限制导致藏人儿童丢失流利使用藏语的能力。在这些学校里倾向于使用普通话教学。当局还压制在寺院和乡镇非正式组织的语言课，他们称这些课为非法结社，并因此拘留和逮捕教师。

政府继续坚称，1995年政府钦定的坚赞诺布是班禅喇嘛的真正转世，而不是当年被当局失踪的更登确吉尼玛。诺布仍是隶属政府的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主席和这个组织中级别最高的藏人。据众多藏传佛教僧侣和学者报告，国家宗教局和省宗教事务局官员经常向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僧侣和普通信众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参加由诺布主持的宗教研讨会议。

根据寺院管理的官方指南，管理委员会和工作组的领导和成员资格仍然仅限于该指南所说的“政治上可靠、爱国、有奉献精神的僧尼以及党政官员”。传统上由僧侣管理的西藏寺院的一般行政事务继续由寺院管理委员会和寺院政府工作组监管，寺院管理委员会和寺院政府工作组主要由政府官员和中共党员组成，再加上几个政府批准的僧侣。自2011年以来，政府已在西藏所有寺院和其他藏区的许多主要寺院中建立了这样的机构。

在报告《高于佛教的党》当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告说，多个中共党政机构参与寺院的“社会管理”。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告，“依照2009年发布的《阿坝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四条，24个党政机关负责维持对阿坝自治州寺院的控制。”

据报道，传统的寺院制度继续衰落，因为许多来自西藏的高级佛教经师在印度或者其他地方流亡，或者客死印度或者其他地方。藏传佛教主要教派的领袖都继续在境外流亡，包括达赖喇嘛、噶玛巴、萨迦赤津法王、噶陀格泽仁波切和苯教领导人曼日赤增隆多达瓦达吉仁波切。政府还禁止在印度训练过的西藏僧侣在中国的藏区寺院讲经，这些僧侣大多接受过达赖喇嘛或与之有关的喇嘛的教育；不过有报道，对于亲政府的僧侣有个别例外。

与往年一样，一些寺院的高僧继续报告说，他们与当地官员达成了非正式协议，只要政府对寺院的管理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当地僧侣就不会举行抗议活动或自焚。消息人士称，当局监控涉及西藏境内寺院和境外实体的所有金融往来。

根据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中共有一份国家批准的“活佛”名单。据报道，这些人继续接受爱国主义和中共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培训。2018年，中国佛教协会宣布它的数据库包含1311个被视为“正统”的“活佛”。据报道，达赖喇嘛不在名单上。据报道，这个数据库与《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要求新建立的数据库有重叠。新建的数据库还包括不是“活佛”的僧侣。

据消息来源称，每个在官方转世数据库中的人都接受了完全与宗教培训无关的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培训。该培训强调这些人在宗教界的事业和角色取决于鼓励宗教信众“爱党、爱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以及与‘分裂主义’和达赖喇嘛做斗争”。一位消息人士说：“这意味着现在西藏的转世活佛正变成共产党培训的人才而不是宗教领袖。”宗教领袖继续报告说，当局强调世俗生活的特色，与约束更加严格和更为简朴的宗教生活相比，鼓励喇嘛和僧侣自愿离开寺院生活。寺院领导人指出，不断修订教育政策、宗教法规和政府对寺院管理的控制是年轻僧侣人数下降的原因。宗教领袖和学者继续表示，这些和其他干预手段继续使他们担心宗教传统是否有能力世代延续。

12月，人权观察报告说，一位不具名高级中共官员在11月访问了西藏索县的三个乡镇，“以确保当地藏人官员支持政府有关承认藏传佛教转世的政策”。据官方媒体报道，120多名乡镇官员、寺院管理委员会成员、驻村干部、村级官员、当地警察和学校教师参加了和这些官员举行的会议，并在会上“一致表示他们愿意遵守有关藏传佛教转世事务的法律法规”。

僧尼除了在宗教研究方面展示能力外，官方还要求他们表现出“政治上靠得住”，“品德上能服众”，而且愿意在“关键时起积极作用”。自该政策2018年实施以来，许多主要寺院和宗教机构都已实施了政治培训计划。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报告《高于佛教的党》包含很多僧尼阅读中共宣传材料和学习包括遵守“政治可靠标准“的“僧尼四条标准”的例子。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道，四条标准政策“实质上要求寺院社区忠于中国共产党并拥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据媒体报道，当局在整个藏区的许多寺院和尼姑庵中继续开展“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每年，所有僧尼都要参加几次“法律教育”课程，在此期间，他们必须谴责达赖喇嘛，表示忠于政府认可的班禅喇嘛，学习习主席的讲话，学习普通话，听赞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讲座。

据多家政府媒体的消息，本年度中中国对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进行了一系列培训。9月，统战部为全西藏宗教教职人员组织了七天的培训，包括“爱国主义电影”和“政治理论教育”，并聚焦于宗教教职人员在坚持中共原则上的角色。课程包括学习《国家安全法》和习主席的讲话。

媒体报道，统战部在4月为40名西藏尼姑进行了五天的培训，重点是倡导“爱国”，“维护国家统一”和跟党走。

当局继续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加任何寺院培训。多个消息来源报告，当局强迫未成年僧尼离开他们的寺院和佛教学校，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记者报道，警察拘捕并且在一些情况下殴打一些拒绝合作的未成年僧人。他们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还被威胁，如果未成年僧人不服从，其他亲人会失去社会福利。

政府官员经常公开诋毁达赖喇嘛，并指责“达赖集团”和其他“外部势力”煽动西藏抗议活动，称此类行为是“分裂”中国的企图。整个一年中，当时的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公开批评达赖喇嘛“集团”，并号召党员干部消除达赖喇嘛在宗教方面的负面影响。《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吴英杰2月份公开给据称是一位牧民的人写过一封回信，呼吁他分享西藏人必须“减少宗教消费”并消除达赖喇嘛“消极影响”的消息。

自由亚洲电台3月11日报道，政府承认的班禅喇嘛坚赞诺布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身份告诉政协说，“境外反华势力将中国的涉藏及宗教事务炒作成国际热点话题，再转化为其所用的政治筹码。”

国有媒体报道，在习主席7月视察青海省期间，他号召西藏人“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并且“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习近平还在7月21日至22日到访西藏，在那里他敦促西藏人“跟党走”。据国有媒体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示地方省级官员努力让西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中国网络公司百度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汪洋8月在西藏发表了谈话，他说：“70年来，西藏民族团结呈现历史性进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消除旧社会的民族歧视、民族隔阂，挫败达赖集团和境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当局通过将寺院与“分裂主义”和支持独立的活动联系起来，继续在官方媒体上辩解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干预是正当的。

在这一年里，没有任何报道称中国与尼泊尔政府于2019年签署的《边界管理系统协定》被用于从尼泊尔遣返长期滞留的藏族难民回到中国。西藏维权团体在这个协议签署时表示，要求两国交出非法越过中尼边界的公民的规定可能与尼泊尔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出的国际承诺，以及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达成的“君子协议”相冲突，该协议规定要把尼泊尔羁押的藏人难民转运到印度。

因新冠肺炎疫情限制，大部分人在本年度无法到国外旅行，包括宗教目的的旅行。在过去这些年里，为宗教目的而要旅行的人报告说，前往印度接受宗教培训、会见宗教领袖，或者拜访住在寺院里的家人仍然十分困难。在许多情况下，公安局官员拒绝批准他们的护照申请。在另一些情况下，想要出国旅行的人只有在向当地官员行贿后才获得护照。一些想旅行的人说，他们只能在保证不去印度旅行或保证在境外期间不会批评政府在藏区的政策之后才获得护照。在某些情况下，家庭成员需要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护照申请人海外旅行后回来。据当地消息来源说，甘肃省、青海省和四川省的许多藏人要等上长达10年才能拿到护照，而且对于耽搁这么久的原因没有任何解释。还有当局没收或注销了先前发给藏人的护照的事例，据报道这是为了防止藏人参加在印度举行的与达赖喇嘛有关的宗教活动。

前往尼泊尔并计划继续前往印度的藏人报告说，中国官员找到他们的家人在西藏的住所，如果他们不立即返回西藏便威胁他们的亲人。四川省和西藏的官员继续要求从印度返回的宗教人士参加政治培训班。消息人士称，这些限制使数以千计藏人无法在印度参加宗教培训。

流亡在外的僧侣和尼姑仍然受到各种限制，特别是在印度的僧侣和尼姑，他们很难或不可能进入藏区。

从印度回国的藏人说，他们很难找到工作或接受宗教或世俗的教育。归国的藏人不允许在中国的寺院学习，大多数人因为没有政府认可的教育文凭而被拒绝进入世俗学校。当地消息人士称，由于在印度的宗教机构有亲戚，一些藏人受到政府的进一步审查。

据消息来源报告，当局在一些地区继续对西藏自治区内外住在酒店里的藏人实施特别限制。警方规定禁止西藏的一些酒店和宾馆接待藏人顾客，尤其是僧尼，并要求其它酒店遇到藏人入住时要通知警方。

**第三节 社会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藏人，尤其是那些穿传统和宗教服饰的藏人，经常报告说，酒店拒绝他们入住，出租汽车拒绝搭载他们，而且在就业或者商业交易方面也受到歧视。

一些藏传佛教寺院和尼姑庵的信息来源称，许多汉族佛教徒仍然表示对藏传佛教感兴趣，他们向这些藏传佛教寺院和尼姑庵捐款。藏传佛教僧侣经常访问中国各个城市，向汉族佛教徒提供宗教指导。此外，越来越多的汉族佛教徒到访藏传佛教寺院。不过有关官员有时施加限制，使汉族佛教徒很难在藏区的许多寺院长期修行。官方的宣传报道了这些活动。

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寺院募集了捐款来购买和分发个人防护设备给当地居民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居民。

**第四节 美国政府的政策与参与**

中国继续严格限制外交官进入西藏，并拒绝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提出的访问西藏的请求。在这一年中，没有美国外交官被允许访问西藏。

美国官员不断向中国政府各级官员表达对西藏宗教自由的关切。包括美国国务卿、12月任命的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以及其它美国国务院和大使馆官员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继续不懈地共同努力，以进一步推动藏人不受政府干扰地保留、从事、传授和发展他们的宗教传统和语言的权利。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和其他使馆官员定期对包括中央政府和省级领导人在内的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就严重限制藏人行使人权和包括宗教自由和文化权利在内的基本自由的能力表达关切。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就中国政府拒绝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向中国高层官员施压。美国官员继续强调，只有达赖喇嘛和其他宗教领袖才能决定达赖喇嘛继任的事务，同时也对班禅喇嘛失踪表示担忧。除了提出诸如阻碍向藏人发放护照之类的系统性问题，美国官员还对个别案件以及宗教迫害和歧视事件表示关注，并进一步寻求有关信息。美国还争取增加美国官员、新闻工作者和游客进入西藏的机会，包括宗教朝圣者和出于宗教目的旅行者。

在本年度内，美国政府使用了各种外交手段推动在西藏的宗教自由和追究责任，包括根据2018年《西藏旅行对等法》，对美国政府已经确认“大量参与制定或执行与外国人进入西藏地区有关政策”的中国政府和中共官员施加签证限制。

7月，美国国务卿在新德里与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忠群欧珠会晤。

3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继任过程中不应扮演任何角色。北京在25年前对班禅喇嘛继任的干涉，包括使还是孩子的班禅喇嘛‘失踪’以及试图以一个中国政府选定的继承人取代他——这仍是对宗教自由的粗暴践踏。”4月22日，在谈到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失踪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尊重藏人根据他们自己的信仰且不受政府干涉地选择、教育和敬拜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权利，例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公布藏人崇敬的班禅喇嘛的下落，并给我们与他本人会面的机会。”

1月，当时的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与达赖喇嘛在网上会见。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达赖喇嘛“强调了保护藏传佛教的重要性”。

6月22日，美国加入由加拿大带头发起的一份有44个国家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对新疆的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对香港基本自由和西藏人权状况的恶化表达深切的关切。

12月20日，美国国务卿选择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的副国务卿兼任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在宣布任命时，美国国务卿说，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将继续“推动对藏人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包括他们的宗教或信仰自由”。

尽管美国官员在这一年中被拒绝进入西藏，他们仍与其他藏区广泛的各类宗教领袖和信众以及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以监测宗教自由的状况。

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利用社交媒体向数以百万中国公民直接传递有关西藏宗教自由的信息。3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美国国务卿对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谈话，指出美国国务卿“对中国一系列行动表示关切。这些行为削弱国际上基于规则的秩序和与我们及我们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相悖，包括与人权、新疆、西藏、香港、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和台湾相关的行动”。在美国总统11月与习主席进行网上会见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和微博上发帖说：“拜登总统对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做法，还有更为广泛的人权问题表达了关切。”